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五卷

李 怡 主编

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 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

谭 梅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广东省原创精品出版资金扶持项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五卷

李 怡 主编

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 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

谭 梅 著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第5卷, 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 / 李怡主编; 谭梅著.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543-0264-4

I. ①现… II. ①李… ②谭…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 ②妇女文学—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9.6 ②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1444号

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

Xingbie Wenhua yu Xiandai Zhongguo Nan Zuoia Xushi zhong de Nüxing Shuxie

策划编辑 张灵舒 张 瑛

责任编辑 黄初镇 张灵舒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杨亚丽

责任校对 张 瑛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 版 人 吴 江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规 格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3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3-0264-4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而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

李 怡

“回到文学本身”，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倡议。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中国文学受制于社会政治这些“文学之外”的现实，我们提出“回到文学本身”，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审美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中国人觉悟到谈论文学不再等同于政治表态，也有别于道德教育，对“文学作品”思想与文字的鉴赏从此成为一件意趣盎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复苏的基础，也是如《名作欣赏》这样的“欣赏类”“阅读类”杂志闪亮登场的历史背景。阅读、欣赏，一个似乎意味着文学普及的名字，在80年代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大众普及”，而成为广大文学研究学者自我训练的起点，在当时，数量众多的活跃一时的文学研究者都与《名作欣赏》等结缘，或者贡献自己的新锐见地，或者长篇连载，甚至在此发表处女之作。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形势”陡变。一方面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都逾越了“文学”的边界，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的领域里一展身手，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跨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政治学、思想史、社会学的一种材料。进入21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式更在中国流行开来。“文化研究”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 Williams）与霍加特（R. Hoggart）。霍加特在1964年创办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从8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美国等地迅速发展，至今，它几乎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进一步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的有机元素，其重点不在品味文学的审美个性，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热衷挖掘社会结构中种种的阶级、权力、性别与民族的关系。可以看到

的现实是，“文化研究热”已经以汹涌澎湃之势在中国高校与学术机构中蔓延开来，每年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学位论文：在文学的学科标志下尽力展开的却是关于社会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广泛讨论，文学现象不过只是其中的部分材料而已。

西方的解构主义也以“文学性扩张”的判断给予这样的思路莫大的鼓励。乔纳森·卡勒告诉我们：“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中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最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他语言之中。”^①

文学内容的日渐稀少的确令我们对“文学”的曾经的痴迷遭逢尴尬，越来越多的“文学之外”的知识领域的入侵让我们对自己的学科归属不无焦虑，甚至“绝望”：

没有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美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

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的文学同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之外，没有人能够被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赦免。正像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剑

^① 乔纳森·卡勒：《文学性》，马克·昂热诺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史忠义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0—41页。

子手，如现在不放下屠刀的话。^①

就是我自己，也因为文学史叙述一再为抽象的理论所占据而充满困惑：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我曾经试图提出：“我们当今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严重忽略了对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原典”）的把握和理解。新的文学史写作必须认真解决如何让文学史的教学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等问题。”^②

当然，所谓学科的“规范”其实并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共识，我们也无法断定跨越性的研究在未来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新的学科，形成新的学术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跨出了文学，试图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领域里寻求伸展的时候，也同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我们怎样将“文学”作为材料，最终都必须在其他学科中取得真正的发现，换句话说，以“文学”为跳板，我们最后要达到的“高度”必须符合其他学科的水准。比如我们可以借用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主题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但那时的中国是不是就如我们这些文学材料中所描述的那样呢，“文学”自己就不足够了，能够检验我们结论的一定是历史学的相关“规范”，我们也可以通过延安文学的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进入社会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的领域，可供我们比照分析的也就主要不是文学的想象，而是一系列丰富的数据与案例，在这个时候，我们既有的知识显然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近几年来，在突破文学边界，进入“文学之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尴尬，例如新左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希望将延安一十七年一“文革”的文学历程肯定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文化硕果，殊不知，不仅其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难以认同，就是近现代史学界与中共党史的学者也颇不以为然。

跳出“文学”的框架，在更大的范围内表述问题，看起来是超逸了文学，其实骨子里却依然动用着文学的想象，所以就无法真正回答“文学之外”的问题。这样的尴尬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① 陈晓明：《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的思考》，《南方文坛》2003年第1期。

② 李怡：《文学史是什么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那么，回到文学自身，是不是就真的可行？真的理所当然，真的理直气壮呢？

如前所述，虽然我们目睹了这一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的激动人心的“拨乱反正”之功，也见识了跳出“文学”之后的种种尴尬和困惑，但是，平心而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更文学”其实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诉求既美丽，更正义，因为我们曾经的文化专制让一切关于文学的讨论都无可选择地纳入了政治表态的范畴，在这时，重申“文学”的价值，其理由不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恢复人基本的言论权利与自由思维的权利。正是在这样一种“正义”的向度上，我坚持高度肯定这一口号的历史意义，并且主张继续研究和光大这一伦理正义的可能，对于90年代就此的诸多批评都不予认同。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在当时，对于伦理正义的强烈渴求的确远远超过了对于口号内涵与学理的细致分析，比如什么是“文学”？什么又是真正的“文学本身”？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当时，在未经严格的学术追问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将这一“文学本身”视作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赋予它某种本质性的猜想，比如思想的现代性，语言的白话，等等。

正是这样未经追问的模糊给了90年代的质疑以机会。当然，这不是说在今天，所有自“文学”逃逸的学人都出自同样的思想基础，但至少其中相当多的人是逐渐感受到了“文学”的不稳定、不可靠，从而企图在“文学之外”的领域捕捉某种真切的事实。比如，我们曾经说，追求“现代”的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涵，但问题在于，深入的考察却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现代”思想却千差万别，胡适有胡适的现代观，陈独秀有陈独秀的现代观，一向质疑的鲁迅更与他们迥然有异，更不要说左翼、右翼与延安道路了；白话呢？虽然可以解释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但是后来的考证也逐渐证明，新文学并不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部现实，何况新文学作家本人也有放下白话，重操文言的选择。如此一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本身”究竟是指什么呢？我理解，就是类似的困惑吸引我们的研究者开始迈出（或者说“解构”）了“文学”的大门，企图在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上寻觅现代中国人的切实追求，而“文学”逐渐降低为社会文化整体面貌的组成元素之一。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是指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

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就20世纪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生长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①

在今天，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历史事实的逐步澄清，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中国作家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等待他们关怀和解决的“问题”绝不只是作为“艺术”的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是不得不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整体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考的，而且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与历史的流变繁复也使得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单纯，介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在这个时候，抽象、笼统地谈论“回到文学本身”显然也是空虚的，无的放矢的。

既不便抽象地诉求“回到文学本身”，又不能因为超逸“文学”而陷落到四不像的尴尬，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努力的方向呢？在我看来，一个可供思考的方向就是：继续回到文学，但不是那种理想化的“纯文学”，而是包含了诸多社会文化信息的“大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未来，也许就在“回到大文学本身”。

回到大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既然文学本来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不妨最充分地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

回到大文学本身，最终体现“本身”的还是“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最终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作品

^①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本身，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

回到大文学本身，我们的理性认知与感性想象、知识社会学的考辨与感悟体验式的批评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发展，曾经以对理性规范的强化来排除文学的感性想象，以知识论的建构质疑体验论的缺陷，其实，即便是在“文学之外”的最抽象的理性思辨之中，我们也难以摆脱骨子里的文学想象，反倒是不能自我承认的这种“想象”干扰了本该“不必想象”的社会科学的认知。与其让想象与感性如此扭曲地存在，不如为他们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结构”。如果我们力主回到以作品阐释为旨归的“大文学”，那么保留和发挥我们的感性想象也就是“文学”的题中之意；与此同时，跨出“文学”的“小”，纳入“文学之外”的“大”，也让其他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有了一席之地，让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的社会科学认知模式有机会进入文学研究，弥补我们既往学术的种种不足。

| 目 录 |

总序：回到“大文学”本身 / 李怡 / 001

引论 / 001

一、“女性文学”批评范畴的重新界定 / 001

二、本书援引的思想资源及倡导的价值尺度 / 005

第一编 男性文本：女性文学研究不能忽略的话语场地

第一章 “女性传统”与古典小说中女性形象 / 013

一、三位一体的“女性传统” / 013

二、“女性传统”影响下古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 019

第二章 现代女性观的形成与女性形象的现代变奏 / 027

一、社会性别关系的新变与现代女性观的生成 / 027

二、现代女性从身体层面到道德层面的重构 / 033

第三章 男性文本：女性文学研究不能忽略的话语场地 / 042

一、女性主义立场：烛照与遮蔽并存 / 042

二、男性文本在女性文学研究中的独特性 / 048

第二编 遭遇“解放”：中国“娜拉”的觉醒与探索

第一章 五四妇女解放新思潮 / 057

- 一、“与时俱进”的性别话语：以《新青年》与《妇女杂志》为考查中心 / 057
- 二、逃婚还是忍耐：现实生活中新男性的艰难抉择 / 062
- 三、个性解放与女性解放的“纠缠”：五四妇女解放话语的内在逻辑特征 / 067

第二章 “婚恋自由与个性解放”启蒙下的果敢与彷徨 / 073

- 一、“情爱”作为抗争的手段 / 073
- 二、抗争之后的彷徨与反思 / 077
- 三、身处困境中的应对 / 081

第三章 遭遇“解放”：中国“娜拉”的觉醒与探索 / 086

- 一、田亚梅：个性解放维度上的先锋女性 / 086
- 二、子君：性别维度下缄默的新女性 / 090
- 三、陈百露：知识女性个性解放道路的终结 / 095

第三编 “解放”还是“囚禁”：中国“娜拉”对革命效能的质疑

第一章 政治化的语境及妇女解放新导向 / 103

- 一、革命与性别的合力：妇女解放的新导向 / 103
- 二、中国女界各阶级分析及国共两党的妇女政策 / 108

第二章 女性革命、性别体验与女性意识 / 116

- 一、女性革命与性别体验 / 116
- 二、女性自我的不断妥协 / 119

第三章 “革命”召唤下的激情与困顿 / 125

- 一、孙舞阳：在革命洪流中奋力搏击的女性姿态 / 125
- 二、春梅姐：女性解放与囚禁的悖论 / 129
- 三、春宝娘：对母性的深沉体悟及对革命效能的质疑 / 133
- 四、蔡大嫂：立于民间的天然“革命者” / 137

第四编 “女性”与“个体”的再谋：中国“娜拉”在战争语境中的反思与突围

第一章 多重空间及其性别规训 / 145

- 一、性别的地缘政治 / 145
- 二、国共两党的妇女政策 / 150
- 三、关于“妇女回家”的论争 / 155

第二章 女间谍：历史、政治与性别的交织 / 159

- 一、叠影重重：女间谍的历史叙事 / 159
- 二、关于身体悖论的质问：女作家对女间谍的文学想象 / 163
- 三、距离把持中的反思：男作家对女间谍的文学想象 / 168

第三章 “女性”与“个体”的再谋：知识分子破解专制的努力 / 174

- 一、踌躇的曾树生与“抗争”的存在与虚无 / 174
- 二、饥饿的郭素娥与动荡时期的原始强力 / 178
- 三、《围城》里的现代女性与女性解放的“围城” / 183

参考文献 / 188

后 记 / 197

| 引 论 |

一、“女性文学”批评范畴的重新界定

在进行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之前，我们要对本书所界定的批评范畴进行说明。这首先涉及的是以什么为主要依据来界定“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之初就引起了争议。关于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至今仍是比较模糊的。谢玉娥《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一书与贺桂梅《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一个历史轮廓》一文对此概念的源流、相近概念的區別以及不同学者的观点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这里不再重复。综合各家说法，对“女性文学”主要有三种界定：一是泛指所有描写女性生活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包括男作家的作品。比如王富仁、刘慧英持这种观点。二是仅仅指女作家的作品。比如李小江、吴黛英、王绯等学者持这种观点。第三种定义不仅仅要求是女作家创作的，还要有鲜明的女性意识以及女性风格。比如陈志红、钱荫愉、朱虹等学者持这种观点。

然而，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的女性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具体实践中，第一种观点应者寥寥，第二、第三种观点却十分盛行。人们普遍将女性文学理解为女作家的创作。对现代女作家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学界按照传统的审美经验对“五四”女作家的特点进行了简单的勾勒，这是较早按照女性文学就是女作家创作的思路进行的研究，他们的贡献在于对史料进行了及时地收集与整理。比如黄英《中国现代女作家》，贺玉波《现代中国女作家》，草野《中国现代女作家》等研究是这方面的力作。这种研究模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80年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才出现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无性状态”的纠正，学界重新返回到“人”的脉络上展开对女性问题的阐释，注重从生理差异的层面来理解性别。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就偏重于对女作家独具特色的艺术

风貌和美学特征进行挖掘。比如于青《女性文学成熟的曙光——论女性文学审美品格之演变》，吴黛英《从新时期女作家的创作看“女性文学”的若干特征》，任一鸣《女性文学现代性衍进》与《女性文学一种新的审美流变——“荒诞”》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二是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由审美批评开始转向强烈的意识形态批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就偏重于既借助文本对男权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猛烈的批判，又从张扬“女性意识”的角度对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与阐释。比如孟悦等《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彭子良《新时期女性意识构成初探》，阮忆《女性文学和女性意识——新时期女性文学断想》等就是这方面的力作。然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强化了“女性文学”就等同于女作家的文学创作这一研究思路。

但是，我们禁不住要发出这样的疑问：“女性文学”难道就是女作家的作品集锦吗？即使男作家对女性问题进行严肃探讨的文本都要被排除在外吗？只要是女作家的创作却与女性问题不相关甚至与女性解放背道而驰的作品也天然就是“女性文学”的组成部分吗？对此，女作家张洁就曾提出质疑，她认为有些女作家并没有认真思考女性问题，而是在兜售“女人的矫情”之类的东西。^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少女性作家拒绝“女作家”的称号，也拒绝从“女作家”的角度对她们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此外，将男作家的创作不问青红皂白地排除在“女性文学”研究范畴之外，其潜意识中是性别对立的观念在作祟。我们必须辨析清楚的是，男权思想并不等于男性。事实上，有些女性的男权主义思想比男性更为严重。因此，女性文学研究要针对的应该是以男权主义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形式，要抨击的也应该是这个不平等的社会契约，而不是男性本身。有些持女性主义极端理论的研究者要么笼统地将男性放在自己的对立面，用偏激的仇恨片面的来阐释这个世界；要么在潜意识中仍然不可避免地套用男性主义的价值判断进行霸权式的论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毫无疑问，这样的做法破坏性大而建设性少，只能将女性文学研究推向坟墓。

本书也无力对“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做一个准确全面完整的界定，只能在将问题提出的同时又将该问题悬置起来，而就本书所从事的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范畴作一点必要的说明。

尽管“女性文学”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至今仍是比较模糊的，但是学界想

^① 谢玉娥主编：《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1页。

把“女性文学”最核心的质数限定在对传统男权思想文化的否定与对现代女性解放肯定的思想框架之内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许多研究者对女性文学研究的兴趣也在于对男权思想文化统治下的女性作为一种特定历史现象和现实存在的关注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对男权文化本身的反思。基于这样的立场，本书所从事的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范畴有如下两层内涵：虽然，“女性文学”研究是以女作家的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并不是所有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天然地属于“女性文学”研究范畴；同样，也并不是所有的男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都应该被排斥在“女性文学”研究范畴之外。也就是说，笔者主张不管作者性别如何，凡是对传统男权思想文化持一种具有女性立场的反思态度、对女性解放持肯定与张扬的文学作品都应该纳入到“女性文学”研究范畴之中。做出这样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首先，文学类型的划分不应该以作者的性别作为归类的依据，而应该以文学作品作为归类的根本依据。无须赘论，很多文学批评家都曾多次强调“文本才是文学研究的根本”这类的观点。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不重视作者的性别、生平、经历等个人因素。有些时候，这些外部因素对于解读一个文本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是说，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根本的缘由去判定与阐述文本。约定俗成的“女性文学”概念就是将作者性别直接作为批评的根本性依据。这就违背了文学研究的基本原理和准则。“女性文学”研究是与女性存在直接相关的研究。这种直接相关显然主要是文学作品的内涵本身，而不是作者的性别。因此，我们的视域里最重要的就是作品本身。就现有的文学类型划分来看，比如“儿童文学”、“市民文学”、“伤痕文学”等概念都不是单纯以作者或读者对象为界定的依据，而是以作品的题材、主题、人物形象以及故事内在的特定意义为界定的基本依据。

其次，做出这样的界定是由于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男女意识混合纠缠的产物。约定俗成的女性文学研究范畴将男作家的创作排除在外是认为男作家难以表现女性意识。事实上，在小说和戏剧这类叙事性较强的文学作品中，作者展示出超强的对象化能力。这种能力让作者能深入体察作品中各种男女人物的内心世界。反过来，这种体察又能提高作者感悟男女两性生命体验的能力。比如鲁迅是个男作家，很多评论者却认为他的小说“阴气”太重；丁玲是个女作家，而她的创作却一直在追寻一种阳刚之美。可见，男性和女性是彼此联系的，男性与女性是可以对话的，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更是互为因果的。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男女意识混合纠缠的产物。我们是无法避开男性的视角来

奢谈中国女性的问题。如果抽离了这样一个视角，所谓的以关注女性发展为宗旨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也将越来越像许多学者所意识到的一样陷于自说自话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论者将男性文本正式纳入到女性文学研究框架之中，笔者查阅到的专著仅有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和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判》。这两本专著有部分章节涉及男性文本。李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一书，用四章的篇幅将现代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分为四大类型：天使型、恶女型、正面自主型和落后型。刘慧英在她的专著中谈到，男作家的“才子佳人”、“诱奸”、“社会解放”等故事处理的刻板程式导致了文本中女性形象“自我”空洞化的结果。这两本专著通过不同的归类方式共同精辟地指出了文学中男权中心意识这一事实。笔者认为这两位前辈的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如前所述，我们在研究男性文本时，除了看到男女两性之间的对立之外，更要注意到男女两性之间的客观存在的沟通与协作。

最后，做出这样的界定是基于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实际情形。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多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就两性文化而言，这一时期的男女两性文化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况。就拿现代女性觉醒这事来说，“中国现代女性意识确实是在反对男性霸权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在反对五四时期男性文学的霸权主义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是在反对儒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及其在现实社会的严重影响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五四时期男女两性的文学是站在同样一条战线上的，将这个时期的中国女性文学与中国男性文学简单对立起来，不但无法正确地描述中国现代的男性文学，也无法正确地描述中国现代的女性文学。”^①就文学创作实绩而言，与刚刚起步的女作家相比，“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像曹雪芹、鲁迅、曹禺这类男性作家，在对女性心理的刻画和描写、对女性愿望和要求的反映或表现上，是较之很多女性作家都更加真实、更加深入的。”^②因此，我们将现代男作家关注与思考女性问题的创作纳入到“女性文学”的研究范畴是合情合理的。

近十多来年来，“性别”这个词在女性文学研究专著与论文中出现的频频出现，女性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正在由“女性”而转向了“性别”。可以这样

① 王富仁：《一个男性眼中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第6页。

② 同上。

说,性别批评是女性文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引入了“社会性别”这一重要范畴,使得人类对性别,尤其是对女性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即它更注重从文化立场上理解性别,强调性别是后天文化所造成,不存在天然的本质差异。需要强调的是性别批评仍然以女性主体性为价值支点,只是研究者使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考查性别问题,将性别问题与阶级、民族、阅历等相关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用以克服在性别问题的认识上的褊狭。也就是说,女作家文本与男作家文本甚至历史文化语境构成的大文本,都可以用来作为相互参照比较的互文文本被纳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将男性文本纳入女性文学研究范畴的必要性。

综上所述,本书认为不管作者性别如何,凡是对传统男权思想文化持一种具有女性立场的审视态度、肯定女性解放、关注女性生存的文学作品都应该纳入到“女性文学”研究范畴之中。在中国现代文学框架中,我们尤其不能忽略那些严肃思考女性问题、关注女性未来的男性文本。做出这样的界定既是基于文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又是鉴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实况。这样的界定不仅有利于了解女性生活的全部,也有利于全面考查女性问题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发展轨迹及其出现变化的原因。

二、本书援引的思想资源及倡导的价值尺度

对“女性文学”批评范畴的不同界定就意味着不同的价值立场,不同的价值立场就意味着背后所整合的不同思想资源和判断标准。下面将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本书所整合的思想资源及倡导的价值尺度进行简要的说明。

第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马克思主义脉络上的妇女解放理论由于中国革命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已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主流。它因此成为我们首先要整合的理论资源。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奠基者。他们的妇女思想不仅为研究妇女问题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而且为解决妇女解放问题制定了总体思路与目标。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专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论著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代表作。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妇女思想散见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文章论著之中,这是唯一一本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私有制是造成妇女被压迫的根本原因所在,私有制的出现导致了阶级社会的产生。在